



第二輯

中學西漸叢書

乐黛云 主编
马 剑 著

黑塞与中国

文化

HESSE AND CHINESE CULTUR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第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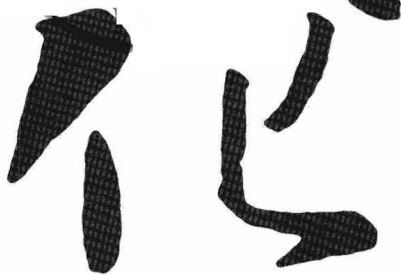
中學西漸叢書

乐黛云 主编
马 剑 著

黑塞与中国



HESSE AND CHINESE CULTUR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塞与中国文化/马剑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656-0203-0

I. ①黑… II. ①马… III. ①黑塞, H. (1877~1962) —关系—
文学交流—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K835.165.5②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7376 号

中学西渐丛书 (第二辑)

HEISAI YU ZHONGGUO WENHUA

黑塞与中国文化

马 剑 著

责任编辑 来晓宇 杨林玉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插页 2

字 数 205 千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博士论文的两位指导老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范大灿教授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德语文学系 Prof. Dr. Rainer Schönhaar

内容提要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共分三章。

在第一章里，本书对黑塞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简短的评述，分析了他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其中特别突出了他对思想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文学创作的主旨。

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和论述黑塞与中国文化接触的过程和他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一方面详细揭示了黑塞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评述和分析他对中国文化典籍的阅读与评价，强调了黑塞对中国文化接受的全面和深刻。

本书的第三章则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在东西方思想史的语境中和背景下分析和解读了黑塞思想和创作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好奇而逐渐喜爱的过程，而是为了摆脱自身精神的危机所进行的思想探索，是为了从异域文化思想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是为了在其他优秀民族的思想中找到自身思考的证明和诠释，是在打着鲜明的西方思想烙印的文学创作主旨下探求一条超越民族、超越种族、超越个体的智慧之路。

总 序

经历了 20 世纪的两战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 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 9.11 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

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①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②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

^① 参见《超越全球化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202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J. 里夫金：《欧洲梦：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2006。

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①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③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④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弗朗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

① 参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56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参见《迂回与进入·前言》，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 参见《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 载《文汇报》2004年7月27日。

存与相互尊重。”^①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②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

① 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文化还是文化间性：从形象学到媒介》，载2001年4月“多元之美”大会文献。

② 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1），5页。

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于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中学西渐丛书第二辑将陆续出版，包括以下5种：《中国禅与美国文学》《黑塞与中国文化》《伏尔泰与中国文化》《荣格与中国文化》《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9年7月1日

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中国人，而在内心当中，我们也根本不想这样做。我们不能在中国和在任何一种往昔中寻找生活的理想和最完美的形象，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并将自己禁锢在一种模式之中。我们必须在自身当中发现中国，或者说发现中国对于我们的意义，并将它们保持下去。

——赫尔曼·黑塞（1921年3月日记）^①

自序

一

迄今为止，我已经不知被多少人问过相同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把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及其作品当作我近十年来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如果要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讲一讲我与黑塞的一段“缘分”。

其实，对于凡是在大学学习期间学习过德国文学史或者德国文学作品选读课程的德语系学生来说，赫尔曼·黑塞这个名字都不应该感到陌生。但是，真正全面地了解这位作家、细致地阅读他的作品并能够对其进行有创造性的解读，绝不是德语专业本科学业能够完成的任务。1998年，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攻读硕士学位，我的导师马文韬教授为我联系到了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德国以出版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而声名显赫的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的出版人西格弗里德·翁塞尔德先生（Dr. Siegfried Unseld）许诺由下属的彼德·苏尔坎普基金会（Peter Suhrkamp-Stiftung）向我提供为期半年的奖学金资助我赴德国研修，而其唯一的“条件”就是希望我的研究项目与版权隶属于该出版社的一位作家有关。于是，在我向苏尔坎普基金会提交研修报告时，我就必须从其“旗下”很多作家中“挑选”出一个来。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为何最终选择了赫尔曼·黑塞，但其中的一个理由是，那时只是

^① Michels, Volker (Hrsg.): Materialien zu Hermann Hesses „Siddhartha“. Erster Band. Texte von Hermann Hesse. Frankfurt am Main 1976. S. 26.



读过他的一部分作品的我对他颇有好感，我记得我那时手中有一本他的《经典短篇小说集》(Meistererzählungen)，收录了他一部分小说名篇，加之我手中还有一本夏瑞春(Adrian Hsia)教授撰写的《赫尔曼·黑塞与中国》(Hermann Hesse und China)，虽然也没有全部读完，但一位德国作家能够有书中介绍的如此不同寻常的思想经历的确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我当时提交的研修报告中，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研究成果中探讨黑塞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关系，没想到，当年的这样一个计划今天才得以真正实现。而另一方面，我在1997年北京大學举行的国际海涅研讨会上结识的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德语文学系的赖纳·舍恩哈尔教授(Professor Dr. Rainer Schönhaar)在得知此事后马上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到斯图加特大学去进行这次研修，于是，1999年3月我得以成行。苏尔坎普出版社首先安排我在法兰克福与负责编辑出版赫尔曼·黑塞作品的编辑福尔克·米歇尔斯(Volker Michels)夫妇见面，他们向我赠送了大量黑塞的书籍，然后，我才前往斯图加特，在舍恩哈尔教授的帮助下开始我的研究工作。从那时起，我便与黑塞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对这位作家的喜爱之情。但是同时，因为赫尔曼·黑塞的作品实在太过丰富，研究资料更是不计其数，因此，在从一种欣赏角度阅读其作品的过程中，在翻阅大量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压力——如何才能在此基础上从全新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人的视角解读黑塞的作品。半年的时间匆匆过去，回国后我便开始着手撰写我的硕士论文，在马文韬教授的帮助下，我将硕士论文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黑塞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著名作品《悉达多——一部印度作品》(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上面，从黑塞反思“自我”问题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解读，最后的题目是《寻求“自我”之路——论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后来，这篇论文在经过部分删节后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四期上。^①在这篇论文中，我也已经开始尝试从新的视角探讨黑塞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关系。

从2000年9月起，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攻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上，我自然希望能够将对黑塞的研究继续下去。2002年，我通过申请和考核获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联合培养奖学金，舍恩哈尔教授也愿意和我的中方导师范大灿教

^① 可参看马剑：《寻求“自我”之路——论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四期，第101至110页，北京，2000年。

授一道共同指导我的论文，于是，我再次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在那里开始撰写我的博士论文。时隔三年后再次赴德，最大的变化便是对黑塞作品理解的加深，终于，在两位导师的精心指导下，2004年，我的博士论文 *Untersuchungen zur „Ich“-Problematik bei Hermann Hesse*（《赫尔曼·黑塞“我”的问题研究》）完成并通过答辩。2007年，经过修改和补充后，这篇论文以“*Stufen des Ich-Seins. Untersuchungen zur „Ich“-Problematik bei Hermann Hesse im europäisch-ostasiatischen Kontext*”（《“我在”的境界——在欧洲和东亚语境中赫尔曼·黑塞“我”的问题研究》）为题由德国柏林的逻各斯出版社（Logos Verlag Berlin）出版。自然，博士论文的篇幅要远远大于硕士论文，而其中的一部分也与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有些许关联。到此，我对黑塞的研究也告一段落，但蓦然回首，八年的光阴已倏忽而逝。

二

赫尔曼·黑塞，这位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作家？又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最能够让人了解他的莫过于他的文学作品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字。就文学创作的体裁而言，黑塞创作的主要是小说、诗歌和散文，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文学和思想评论家，一位编辑，曾经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学、哲学和文化的书评与杂文，此外，他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自称过着“局外者”生活的他是一位非常喜欢写信的人，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写下了大约四万多封书信，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与家人、亲戚、朋友、其他作家、文化界名流和读者探讨各种各样问题的信函，因此，至少有几千封、甚至上万封信在今天看来对于了解黑塞的创作和思想、甚至是对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近年来，黑塞与一些著名作家和社会名流的书信也开始陆续结集出版。于是，走进赫尔曼·黑塞的文字世界时，读者会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人生的万花筒，黑塞使用语言文字所谈论的主题之多、所描述的情景之广泛，都令人叹为观止——从个体到群体，从日常生活到社会事件，从人的成长到道德修养，从文学创作到哲学思辨，从民族精神到文化交融，从慷慨陈词到嬉笑怒骂，使人无时无刻不会感觉到作家所特有的异常活跃的精神脉动；走进赫尔曼·黑塞的文字世界，读者会感到仿佛乘上了一辆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时光快车，是黑塞的笔墨把今天的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那个一方面动荡而又充满了生气，一方面狂躁而又不乏宁静，另一方面迷惘而又闪烁着睿智的时代；走进赫尔曼·黑塞的文字世界，读者会感到字里行间所饱含的充沛情感，那既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一般的亲情，有“士为知己者死”一般的友情，有缠绵悱恻的爱情，还有对于时局“横眉冷对千夫指”一般的愤懑之情，对于时代精神充满忧患的责任感，更有孤立无助、无人喝彩时的忧郁感伤，对未来饱含热切期盼的憧憬；走进赫尔曼·黑塞的文字世界，读者会感到进入了一座书籍的宝库，一个思想的家园，虽然很少有人会把黑塞与纯粹的哲学思辨联系在一起，但在他的文字中，读者分明会读到作家用简洁的语言描绘的自己的思维过程，细细读来，才会发现这样一位作家一生的努力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上的精益求精，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个体自身精神和思想的奋斗。可能没有哪个作家会像赫尔曼·黑塞那样，从他数不胜数的文字中，读者可以如此真切地了解作家一生丰富的经历，可以如此贴近地倾听作家的心声，可以如此直接地阅读到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的感受和思想。尽管黑塞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语言明白晓畅、娓娓道来，在很多用德语写作的作家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不易解读的晦涩的语言描写、离奇的不合常理的情节在黑塞作品中相对较少，但由于其对生命的深刻洞察、由于其对创作的不懈追求、更由于其深邃的思想内涵，他的很多看似内容简单的作品解读起来却并非易事，而和他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是，在黑塞的书信和评论文章中，其文字不再具有那么多的矫饰和刻画，不用再去披上什么掩饰的外衣，而是可以直抒胸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作家、看到一个一方面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过着日常生活、拥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而且并非逃避现实的个体，一个在另一方面又卓尔不群、令人高山仰止的人中的智者。

三

因此，在研究一位像赫尔曼·黑塞这样的作家时，研究者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一方面如何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看懂黑塞的作品，最起码要了解其中的情节和内容、继而当然是其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在试图解读作品时如何寻找到一条甚至几条能够贯穿其创作的主线。于是，按照这一思路，在我的研究中，我便越来越强烈而清晰地感觉到一条主线的存在——那就是黑塞对作为个体的人的问题的探索。由于个人的境遇，探索个体如何在人生进程中克服周围环境和他人制造的障碍，寻找和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发展自我的道路并从而赋予生命一个属于自己的意义，可以被看做黑塞全部文学创作的主题。而在这基础上，我又在研究中不断发现，黑塞所探究和描述的这条所谓个体的人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固然与现实的生活有关，但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是从作为主体的个人出发对自我和世界展开的思考。正因为如

此，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才把这些内容的出发点高度概括到了“我”这个概念上，即德语中的“*Ich*”这个词上，这里的“我”，既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又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同时它也代表了人精神和思想的本质核心，这个“我”在黑塞的全部思考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黑塞的文学作品中，描述了一个作为认识主体的“我”如何看待作为客体的自身和周围的世界，因为一个个体要想发展自我，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对自己——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个体——有彻底的了解和认识，在这里，在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这个概念自然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和很多德国作家一样，黑塞从青年时代起就研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著作，受到了古代和近代乃至现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他最终阐述出一种属于自身的“哲学信仰”，由此，在探讨“我”的问题时，黑塞绝非凭着主观臆断或者靠着情绪的一时冲动，而是更多地把自己围绕着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富于理性的深刻思考用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方式记录下来。因此，我最终决定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去解读黑塞的作品和其中蕴含的思想，也就是说，把黑塞关于“我”的思想置于其哲学思考的基础之上并将其哲学思考置于西方哲学和思想发展史的大的框架之中。于是，其文学作品和文字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关于“我”的问题的睿智思考便成为了我的研究重点——赫尔曼·黑塞在我心目中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者。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研究黑塞便会比研究其他很多作家多出了一个维度——由于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经历，黑塞先是接触到了印度文化和佛教思想的很多内容，继而把其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翻译成德语的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作品以及近代文人的著作，并深深为之吸引，写出了很多评论文章，而最关键的是，他把从中国文化中吸收的养分也写入了其文学作品。于是，在我的研究中，我反复思考的问题便是——第一，为什么黑塞会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会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甚至把它看做自己的一片精神的家园？第二，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黑塞的思考、影响了他的创作，尤其是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对“我”的问题的思考。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却又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吸收与那些国外汉学家的接受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原因很简单，黑塞并非汉学家，不认识汉字，不会讲汉语，也从未到过中国。他阅读的中国著作都是德国汉学家们由中文、甚至是从英语、法语翻译的作品。所以，黑塞对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一定有他自身的特点，



也就是说，无论汉学家们的译著多么接近原文，黑塞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一定与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今天的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撰写我的博士论文时，我从一开始就决定不把研究重点放在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问题上，而是以研究其“我”的问题为主线，把这个问题放在东西方文化、尤其是思想史的大的语境下去探讨。一方面，我认为黑塞对“我”的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既与个人的经历有关，但也深受西方哲学史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影响。这里，在舍恩哈尔教授的提示和建议下，我在德国 20 世纪著名哲学家、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思想中发现了与黑塞思想的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我认为黑塞将个体发展分成若干层次和阶段的思想和他几乎同时代的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新儒学的重要代表冯友兰（1895～1990）关于人生境界的思想也有许多相近的表述。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从三个方面，即作为个体的“我”、作为社会存在的“我”和作为思维主体的“我”分析和解读了黑塞笔下的“我”。其中尤其是在第三部分里，通过把黑塞的思想放在东西方思想史发展的对照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黑塞关于“我”的思考是何其的深刻而睿智。

之所以写这些，我首先当然是想向读者介绍我迄今为止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状况，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我此前所从事的研究、采取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and 现在要撰写的这本《赫尔曼·黑塞与中国文化》一书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别。如上所述，在我那本用德语写作和出版的专著中，我更多地是把黑塞的文本和思想放在中西方思想史的比较语境中加以解读，于是，这与本书的内容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区别：第一，我没有详尽地记述和评论赫尔曼·黑塞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第二，我几乎没有评论和分析黑塞作品中的所谓中国元素；第三，我也很少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明确地断言黑塞的某部作品、某个思想来自中国文化，即使下这样的结论，我也必须拿出足够而充分的论据。然而，恰恰是这些区别倒成为了我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成为了我接受这本书写作任务的理由，因为这本书恰好给了我对上述内容进行研究和梳理的机会。

另一方面，我此前的研究无疑也会对本书的写作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我坚决地认为不能够脱离黑塞的思想和创作孤立地探究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因此，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希望用尽量简短的篇幅概述黑塞的生平和创作，一方面分析他接受中国文化的各种主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与中国文化之间搭起一座联系的桥梁。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主要根据现有的资料，评述了黑塞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和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从篇幅上看，这一部分占据了本书相当大的一

部分。迄今为止，在德国出版的关于赫尔曼·黑塞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成果中，加拿大籍华裔教授夏瑞春先生的《赫尔曼·黑塞与中国》一书^①虽然已问世了近30年，但仍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搜集到了大量关于黑塞接受中国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线索，我在撰写本书第二部分时曾多次从中受益，虽然该书中也有不尽之处或者错误，但毕竟给出了足够的参照，因此在这里也向夏瑞春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敬意！而同时，我在为这部分内容搜集资料时也发现，由于已出版的黑塞的文字数量巨大，因此，对于同样的资料，各种不同的版本提供的信息之间甚至都有出入。对于这一部分，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揭示黑塞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过程；二是根据我对其思想和作品的理解，把重点放在他对中国文化典籍的阅读和评价上。这就是说，在这一部分中提到的文献并非面面俱到，并不是一个黑塞谈论中国文化的资料汇编；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把手头掌握的资料尽量全面地展现给读者，由于这些文献的绝大部分此前都未曾译成中文，所以在写作这一部分时，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使读者真实而详细地了解到中国和中国文化所带给黑塞的感触和启迪，这里，对文献的来源出处也力求准确详尽。

而本书的第三部分则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分析和解读黑塞思想和创作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好奇到逐渐喜爱的过程，而是为了摆脱自身精神的危机所进行的思想探索，是为了从异域文化思想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是为了在其他优秀民族的思想中找到自身思考的证明和诠释，是在打着鲜明的西方思想烙印的文学创作主旨下探求一条超越民族、超越种族、超越个体的智慧之路。

四

2008年6月，也就是在本书开始写作后不久，我应米歇尔斯先生的邀请赴瑞士的西尔斯·玛丽亚（Sils Maria）参加了第9届西尔斯黑塞国际研讨会（9. Silser Hesse-Tage）并在大会上宣读了介绍和评价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译介和研究黑塞作品的情况的论文，因此，我也将这篇用德语撰写的论文和在写作这篇论文时搜集到的关于国内近30年来研究黑塞的学术论文目录附在本书的正文之后，供相关研究者查阅。

^① Hsia, Adrian: Hermann Hesse und China. Darstellung, Materialien und Interpretationen. Erste Auflage 1981. Erweiterte Neuausgabe 2002. Frankfurt am Main 2002.